

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

陈世伦

【摘要】本文为对柬埔寨华人社会中的粤属社团与乡缘认同组织的开创性研究。本文以笔者 2013—2017 年间在柬埔寨华人社区民族志田野访谈的资料为基础，通过对整体柬埔寨华人社会族群结构与历史发展的介绍与分析，阐述柬埔寨当代政经发展的历史基础和殖民遗绪。其后进一步探讨当前柬埔寨粤属社团现状，特别是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下属的“两馆”以及柬埔寨中国商会下的“两会”的成立、发展、营运与会籍制度，并深入剖析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与发展困境。最后进一步归纳柬埔寨粤属华社分群及其次族群/地域认同形成的实证经验与理论范式，以探讨次族群认同或地域认同作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研究基础单位的可能性及其对于落实侨务政策的必要性。

【关键词】柬埔寨；华侨华人；社团；地域认同；次族群；华社；广东

【中图分类号】D634.3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99(2017)05-0120-19

随着中国—柬埔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柬埔寨在中国的东南亚区域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及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由于历史与殖民经验的影响，柬埔寨一直保持着和谐稳定的“柬族政治—华人经济”二元结构，一般人相信，占总人口 3.5% 的柬埔寨华人稳定地控制、影响着柬埔寨 80% 的 GDP。另有两件事情可简单说明柬埔寨华人社会对我国侨务政策的重要性。第一个是柬埔寨拥有全球最大的海外华文学校端华学校，同时亦拥有仅次于首尔孔子学院的全球第二所孔子学院；第二个是国务院侨办 2015 年在金边成立了“华助中心”，这是首批 18

【作者简介】陈世伦，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东南亚研究中心暨华侨华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基金项目】广东省侨办 2014—2015 年侨务理论研究课题“促进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建设发展研究”（GDQW201409）；2017 年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教师培育项目（1709061）。

* 感谢陈奕平教授、陈贤波副研究员对前期成果的宝贵评论意见，然为文有所疏漏，作者自负全责。

个获准成立的海外华人、公民急难救助中心之一，更是 18 个国家政府中最早与中国一起携手完成设立的华助中心。由此可见柬埔寨华社一直以来在中国侨务政策中扮演的重要桥头堡角色，一如习近平主席 2016 年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前专文指出的，中柬是“情同手足、肝胆相照的好邻居”^①。而在柬埔寨华侨华人中，80% 能讲潮汕方言，再者为客家、广肇、海南与福建裔人士。因此，本文拟针对柬埔寨华人社会中的粤属社团做一深入研究与分析。对于潮汕、广肇（府）裔占近八成的柬埔寨华人社会来说，惟有加强对粤属社团发展的理解，才能深化对当前柬埔寨华社生态与文化的掌握，从而确保将来国家侨务政策对柬埔寨华社的效能与资源分配。

一 文献综述：地域认同与海外华人社会分群现象研究

就世界柬埔寨研究文献而言，全球柬埔寨研究长期以来一直过度聚焦于红色高棉历史、国内政治研究与国际关系三个方面^②。对于柬埔寨华社的研究和理解，目前大多数学者仍然以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的柬埔寨历史、潘妮·爱德华兹（Penny Edwards）的殖民史研究为基础，以威廉·维尔莫特（William Willmott）教授于 1967 年和 1970 年出版的两本专著为主要参考资料^③。维尔莫特教授之后，由于柬埔寨长期内战的混乱局势和资料不足，50 多年以来，当代国际海外华人社群研究中一直缺乏对柬埔寨华人社会深入且充分的学术研究与理解，对于当前柬埔寨境内的粤裔与粤属社区的研究尚属一片空白，不但相关的文献数据资料缺乏，现有的了解也仅限于媒体的少数商情报道^④。这样的研究现

① 习近平《做肝胆相照的好邻居、真朋友》，《人民日报》海外版，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6-10/13/content_1718284.htm

② 陈世伦《柬埔寨华人社群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16 年第 3 期。

③ David P. Chandler, *A History of Cambodia*,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2000; Penny Edwards, *Cambodge: The Cultivation of a Nation, 1860-1945*,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W.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Vancouver, Canada: Publications Centr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1967; W. E. Willmot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London; New York: University of London, Athlone Press; Humanities Press, 1970.

④ 当前国内针对柬埔寨华人社会的研究成果有邢和平、王士禄、周中坚、高斌、温北炎、廖小健、庄国土、许梅、毕世鸿、罗杨等学者发表、编著的文献成果，及其他七本硕博论文；而西方研究成果方面，在维尔莫特教授的两本专著后，只有潘妮·爱德华兹 1997 年完成的调查手稿、鲍妮瑞（Pál Nyíri）的柬埔寨华人资本研究、野泽知弘的华社调查以及安卓·马塔（Andre Martha）的中柬关系史研究，其后则只有笔者本人于 2015 年完成的夏威夷大学博士论文。该论文根据 2013—2014 年间的民族志田野调查成果，通过对当前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民族志、社区结构、组织运作、会员会籍制度与认同习得的研究分析，完整地重建了当前柬埔寨华人社会的现状与发展，也填补了维尔莫特专著出版后近 60 年的柬华民族志调查成果的空白。惟该成果对于柬埔寨华社的地籍分群的论述有限，因此本文可以视为该论文与笔者民族志调查的深化，也是对柬埔寨华社分群研究的初步成果。具体的研究成果与文献回顾参见陈世伦《柬埔寨华人社群研究的文献回顾与现状》，《华侨华人文献学刊》2016 年第 3 期。

状反映出对海外华人多样性缺乏足够的关注。单就当前国内外学界对海外华人及其内部的社区分群、文化多样性、次族群身份认同丛集 (Identity Complex) 的研究来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常识性分群概念一直是社会动力学与文化人类学对群体划分、社区共同归属与群体意识的理论与实证基础^①。而随着实体边界的模糊化、网络与沟通模式的虚拟化发展,巴斯 (Barth) 1969 年提出的族群边界理论、本尼迪克·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1991 年提出的“想象共同体”、斯图亚特·霍尔 (S. Hall) 的“表征认同”,延续到后来阿密特 (Amit) 与拉波特 (Rapport) 就边界理论与社群单位本位论的辩论^②,这些类型的单变量理论框架与脉络变迁代表的是不同时期群体认同理论及概念演化的不同进程。然而这样的群体归属、他我群体的边界划分以及族群认同推论却鲜在海外华人认同理论中获得关注。相反地,当前海外华人族群认同研究多半以历史及政经变迁为脉络,在文献、数据与政策史料中寻找共同性,或尝试定义华人族群及其文化认同行为中的族群变量或标的,在概括性与解释力的限制下,便忽略了群体或族群内部的多元差异。而建构论的单一认同体系即其边界划分,或本质论的标签性身份归纳等两种极端也忽略了族群认同包含的多层次、多结构性差异。克里斯曼 (L. W. Crissman)、弗瑞德·布莱克 (Fred Blake)、安东尼·科汉 (Anthony Cohen)、菲尼与王 (Phinney & Ong)、安德雅思·维默尔 (Andreas Wimmer) 等分别提出相似的族群分群结构 (segmentary structure) 的概念^③,许多实证研究更在族群认同的概念内加入了性别、世代、方言、阶级、教育与社会化历程、社交与同侪压力、政治与权力竞争、生活经验、国籍身份转变、历史背景等多样、多结构的参数。也就是说,当前海外华人族群认同的实证研究趋势,已经从过去的表述性标签与文化界限的定义转移到内部差异化变异的辨识,而这也是本文关注一个“去空间化与去疆域化”分群结构的主要原因。因此就研究方法来说,对海

① Fredrik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Waveland Press, 1998; Jean S. Phinney, and Anthony D. O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 54, No. 3, 2007.

②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Universitetsforlaget, 196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4;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Jonathan Rutherford ed., *Identity: Community, Culture, Difference*, Lawrence & Wishart, 1990; Stuart Hall ed.,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Sage Publisher, 1997; Vered Amit, and Nigel Rapport, *The Trouble with Community: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Movement, Identity and Collectivity*, Pluto Press, 2002; Vered Amit ed., *Realizing Community: Concepts,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Sentiments*, Psychology Press, 2002.

③ C. Fred Blake, *Ethnic Groups and Social Change in a Chinese Market Tow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1; A. Cohen, *Signifying Identities: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Boundaries and Contested Values*, Routledge, 1999; L. W. Crissman, “The Segmentary Structure of Urb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Man*, Vol. 2, No. 2, 1967; Jean S. Phinney and Anthony D. O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 54, No. 3, 2007; Andreas Wimmer, “Elementary Strategies of Ethnic Boundary Making”,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31, No. 6, 2008.

外华人社会分群现象的研究必须基于海外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实践与观察之上，才能建立海外华人社会内部多样化研究的新个案，充分结合身份认同与社会分群理论，实现对民族志研究方法、族群认同理论与社会分群理论的全局结合与推进。

因此本文可视为“地域认同对海外华人社会分群影响”的开创性研究。本文以笔者于2013—2017年间12次共计17个月赴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民族志调查成果、访谈与资料收集成果为基础，首先以柬埔寨华人民族史志方法（Ethno-historical Ethnology）切入当代柬埔寨华人社会发展历史纵深，说明柬埔寨的政经发展历史基础和殖民遗绪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接着以当前的柬埔寨华人社会分群现象为背景，聚焦于柬埔寨华社中的粤属/粤裔社团，特别是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下属的“两馆”，以及柬埔寨中国商会下属的“两会”（即柬埔寨潮州会馆、柬埔寨广肇会馆与柬埔寨中国广东商会、柬埔寨中国潮汕商会），深究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现状、特点及其在社团组织、社区结构、会籍管理、人际社交网络、认同教育与文化延续、方言与乡缘地域认同互动等六个不同变项上的发展与演化，并进一步深入剖析当前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传承、发展及其困境。

二 柬埔寨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发展

在理解柬埔寨粤属华侨华人社团的历史与现状前，本研究必须先对整体柬埔寨华人社会的族群结构（ethnic structure）做一介绍与分析。从历史记录来看，华文中可追溯最早的柬埔寨相关纪录为1295年周达观出使真腊后所撰写的《真腊风土记》。周达观的记录显示当时的真腊已经有特定的木造围城“唐人”聚落，而根据当地流通的“唐货”判断，当时屯驻真腊的唐人多半来自今日江苏仪征、浙江温州、福建泉州与广东番禺一带，而所有占城、真腊一带的商船航线亦多半开经今日的泉州、广州、琼州等闽、粤、琼三省的港口，可见今日柬埔寨早于公元1295年便有闽、粤商贾旅居当地^①。而根据西方文献的记载，迄法国于1863年将柬埔寨王朝纳为保护国，1887年再将其划入“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殖民地为止，华人已经在柬取得了绝对的经济优势。因此，法国殖民当局基于殖民利益与统治效率，对柬埔寨实施间接殖民统治，导致在柬埔寨广大的传统农户农民社会之上形成了所谓的“柬族政治—华人经济”的二元精英传统^②。

单就柬埔寨华社的历史来说，根据维尔莫特的研究，法国殖民前的华人社会已经有组织化的五大方言会馆存在，记录显示柬埔寨最早的华社组织成立于1814

①（元）周达观著，夏鼐校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

② 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15, p. 229.

年，由当时的扶南嘉隆王阮福映根据当时华人社会的方言族群，分别成立 7 个帮会（广东、福建、潮州、客家、海南、福州和琼州）。法国于 1863 年进入柬埔寨后，把原来的 7 个帮会整并为目前所知的五大方言会馆，并选定 5 个族长为首，给予族长内部自治管辖的政治权力，分别领导 5 个帮会，并由 5 个帮长合议成立“五帮调解委员会”（后称“五帮公所”），调解仲裁华人社区内部纠纷，传达法国殖民政府的行政命令。五帮公所后于 1900 年到 1923 年间升格成为“中华总会馆”，总理柬埔寨华人社会的事务。及至 1948 年，有“国中国”（State of the State）之称的五帮会馆被迫解散，华人社会的自治权力整并入即将成立的王国政府，并于 1952 年另外成立一个联谊性质的同乡组织“中华理事会”。到 1958 年柬埔寨王国政府取消其运作之后，另外由慈善、社会公益性质的“中华医院医疗协助理事会”取代成为柬埔寨华社的领导组织。然而无论最高机构为何，百年来柬埔寨华人社会一直在五大会馆的领导下稳定发展，后来随着 1970 年内战爆发，华社相关活动才被迫中止^①。

当前的柬埔寨华侨华人社团延续法国殖民时期留下的“柬族政治—华人经济”的二元社会结构，保留柬族皇室作为政治统治的象征，并根据传统在华人社会内部设立一个最高领导机构，下辖 5 个方言会馆、13 个姓氏宗会、各地方柬华理事会与华校。这五大方言会馆包含着华人的祖籍地概念，分别是潮州会馆、广肇会馆、福建会馆、客家会馆与海南会馆，其上面则设有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统辖管理所有华人社区事务，并作为与政府、中国侨乡沟通的最高窗口。然而，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不像法国殖民早期的华社那样拥有独立的民族自治权（ethnic autonomy），可以管理成员的入出境、户籍、税收、私法习俗、经济秩序与武装势力。这样的“国中国”势力在柬埔寨民族运动兴起后，逐渐遭到压抑与拆解，加上 1953 年柬埔寨独立后，柬族政治精英逐渐通过国籍归化办法的制定、教育的管理、中文学校人头税的抽取、限制职业与经济活动等方式压迫华人自主空间，因此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柬埔寨华人社会开始呈现负成长的态势^②。到 1970 年内战开始，华人主要从事贸易，作为金边中产阶级主要构成的华人逐渐流出^③。一直到 1991 年新柬埔寨王国政府在联合国介入下，重新召开大选并成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内阁政府，拥有经商头脑与经济优势的华商遂在人民党的支持与鼓励下重新组织华社，重开华校，逐渐恢复战前的活络与经济优势。然而，重新繁盛的华社不再肩负族群自治的权力，而是纯粹作为华人之间联谊、社交、延续华文教育与传统文化的社会组织。

① W. E. Willmot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Cambodia*, pp. 7-22.

② 参见周中坚《柬埔寨华侨华人史主要事件述略》，《东南亚》2003 年第 4 期。

③ 齐坚《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炎黄春秋》1999 年第 9 期。

从1991年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成立至2016年,柬华理事总会一直在前会长杨启秋勋爵的领导下稳健成长,繁荣发展。其组织与会务发展历经几次变革与调整,目前辖下共有5个会馆、6个公校,还有13个宗亲会及68个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地方柬埔寨华人理事会,另外在首都金边周围还有6座华人庙宇、狮队以及相关联谊会的周边组织^①。其中可以视为粤属社团的主要有柬埔寨潮州会馆与柬埔寨广肇会馆等两大会馆^②。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柬埔寨华人80%为潮汕人士,潮州话一直是华人社会的主要方言,目前几乎所有的柬华理事总会的理事干部都能讲潮汕话,因此就主流方言、文化共同性来看,整个柬埔寨华人社会几乎可视为广义的粤属华侨华人。不管是狭义的粤籍社团或是广义的粤属社团,柬埔寨华人社会长期以来与广东省侨办、侨联、省内各地方侨办以及暨南大学皆有深厚的友谊与频繁的互动,许多重要的柬埔寨侨领、华商、巨贾或政府部门的重要华裔官员等,皆曾协同家人返乡回广东寻根祭祖。因此,柬埔寨华人社会长期以来一直与广东侨乡有着紧密的亲缘枢纽,这也是广东省可以重视、善用并发挥其影响与贡献的重要海外华人社区。

单就柬埔寨华人社团的中流砥柱——柬埔寨潮州会馆来说,文献显示最早于19世纪80年代,金边就已有专门的潮州人社区聚落,贡布和磅湛也于1900年左右就开始有潮州人的同乡社团存在,1941年到1945年泰国一度兼并马德望时,更有数以千计的潮州乡亲从泰国移居过来,成为当地最大的华人方言族群^③。柬埔寨最早的华校、磅湛的新民小学就是由当地的潮州同乡会于1901年成立的,1907年由潮州会馆于金边成立的端华学校更逐步成为柬埔寨华文教育的中心。甫庆祝百年校庆的端华学校不但是柬埔寨第一个招收女学生的华校,吸引了最优秀的柬埔寨华人就读,更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海外华校^④。约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柬埔寨的潮州人便超越原本人数最多的广肇人,成为柬埔寨华人中最大的一支方言族群。1960年的华人口数量统计显示,当时10个柬埔寨华人中就有7个是潮州人,在金边之外的农村省份,10个华人中更有高达9个是潮州人。当

^① 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pp. 24 - 26.

^② 另外三个会馆分别是海南会馆、客家会馆与福建会馆。其中客家会馆是以客家方言为核心的分群组织,其成员的祖籍地遍布今日广东、福建的惠州、梅县、清远、汕尾、韶关、新丰、汀州等地,亦可归为粤属社团,惟当前柬埔寨客家会馆人数锐减,方言语微,与海南会馆一样面临弱化的世代危机。不过,海南会馆仍获得许多琼裔柬华名流巨富及少数耆老的支持,尚能维持会务与庙寺的日常运作,而客家会馆则只能以其客属崇正学校为核心运作,会馆的日常运作面临财务困境与会员凋零的较大危机。目前老移民、新移民多半以潮州、广肇会馆及广东商会为主要活动场域,加上篇幅与访谈资料限制,因此客家会馆与琼雷地区华社组织容日后另文讨论。

^③ 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pp. 70 - 72.

^④ 柬埔寨潮州会馆《柬埔寨潮州会馆成立20周年纪念特刊(1994—2014)》,2014年,第215页。

时柬埔寨潮州人多数来自揭阳、潮阳和普宁三乡，根据维尔莫特对当时潮州义地墓碑的统计，37%坟墓的祖籍地为揭阳，29%为潮阳，20%为普宁^①。一份1963年的报道更显示，当时柬埔寨最富有的9个人中，就有7个是潮州乡亲，另外2个则为海南人^②。到内战爆发前，一般认为潮州人主宰着柬埔寨的贸易和商业，在不同省份主营不同产业，譬如金边的黄金与换汇交易、磅湛的烟草种植。由于长期的华文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加上潮人社区相互协助与支持的团结传统，战前所有想要在柬埔寨做生意的人都必须学说潮州话才能顺利经营。由以上历史纪录来看，无论是从历史、规模还是影响力来说，柬埔寨潮州会馆从1814年首度成立以来便一直是柬埔寨华人社会最重要的一股稳定力量，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一跃成为柬埔寨最大的同乡会所和华人社团，其功能和角色虽然随着不同时代的政治环境而转变，但是通过商业优势、族群方言与族群网络的巩固，柬埔寨华社中的潮汕文化认同一直强势地延续着。

三 柬埔寨粤属新移民社团

除了前述柬埔寨华人传统社团，近年来柬埔寨华人社会最引人注目的即是大量移入的中国企业和创业者。而当大众把焦点放在北美、欧洲、非洲的中国大型企业时，柬埔寨、老挝、缅甸等邻近东南亚国家正悄悄崛起，成为中国年轻创业者、国企投资的重要据点。而柬埔寨的自由经济体系、快速发展和华人经济优势也吸引了超过40万来自中国大陆、港、台、新马的华人转赴柬埔寨投资生活，尤其是2010年以来，中国移民大量涌入柬埔寨。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政策的推动，加上柬埔寨近乎完全开放的政治、经济体系，还有华人的经济优势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渥条件，大量涌入柬埔寨经商生活的中国新移民逐渐获得学界、商界与政界的注目。一般估计目前在柬埔寨境内有25万中国公民，除了大量的国企干部、援建项目的从业人员，更有大量的个人夹带着中国改革开放后雄厚的个人财经实力进入柬埔寨创业生活。这些赴柬埔寨开疆辟土的新移民，除了原本因为支教、援建以及私人企业雇用而到柬埔寨工作的单身青年专业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在同乡、同学、朋友等“六同”关系介绍下赴柬冒险、淘金创业的中小企业代表。这些新移民多半不善英文、柬文等外文，却可以凭借潮汕话等方言与本地华商建立深厚关系，进而合作经商，一起建构中柬两国间的跨国商贸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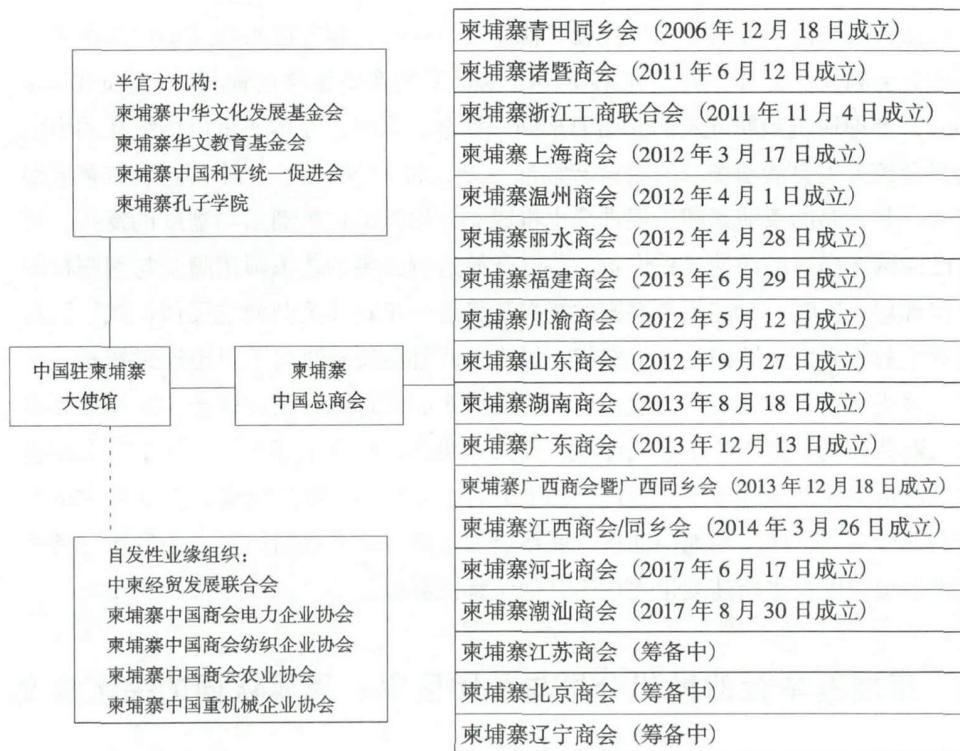
在早期柬埔寨中国商人多为国企干部和援建专业人员的条件下，以公司企业会员为主体的中国总商会成为柬埔寨中国同胞最主要的联谊场域，然而随着大量

^① William E. Willmott, *The Chinese in Cambodia*, pp. 14-15.

^② 柬埔寨潮州会馆《柬埔寨潮州会馆成立20周年纪念特刊(1994—2014)》，2014年，第217页。

新移民的涌入，以中国各区域认同为主体的乡缘组织与商会逐渐于 2010 年后成立。目前柬埔寨的中国商会组织与同乡会组织正在方兴未艾的组织成立过程中，因此许多非正式的联谊社交圈尚未为外界所知。根据笔者在柬埔寨的长期田野调查，目前在柬埔寨的中国商会及其周边所属的乡缘、业缘组织结构图如表 1 所示。

表 1 柬埔寨华侨华人新移民社团组织结构列表



资料来源：部分资料转引自 Shihlun Allen Che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s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Doctoral Dissertation, 2015, p. 179.

由表 1 可见，所有的地方商会都接受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与柬埔寨中国商会的领导与管辖，经过商会与使馆认证的地方商会会长也成为商会理事成员。在此之外，还有相关的半官方机构与自发的业缘组织。这些半官方机构包括汉办直属的柬埔寨孔子学院、柬埔寨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柬埔寨华文教育基金会、柬埔寨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等。而自发性的业缘组织则包括中柬经贸发展联合会、柬埔寨中国商会电力企业协会、柬埔寨中国商会纺织企业协会等。这些自发性的业缘组织不同于地方商会与前述半官方机构，其组成与运作并不完全受使馆或中国

地方外事单位所管辖，也不是必须完成柬埔寨官方的机构注册。

作为旅柬广东人的联谊组织，广东商会也于 2013 年 12 月 13 日正式成立，笔者的田野调查发现，目前广东商会拥有超过 200 多名个人会员，多数会员来自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地区。其中许多人原本在深圳、中山、东莞等地从事传统的制造业或个体经营中小企业，随着中国新劳动法的出台，加上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雁行模式产业外移，便跟随外移的制鞋、纺织厂迁徙至柬埔寨的新产业聚落。因此广东商会会员的产业属性同质性较其他商会高一些，相互往来与互动的程度亦较其他商会频繁。另外，许多在柬新移民也是依循亲属链移民模式（Chain Migration），亦即通过亲朋好友的介绍而来到柬埔寨。同时，原本一直以传统社团中的潮州会馆为主要活动场域的旅柬新潮汕乡亲，也于 2017 年 8 月成立柬埔寨潮汕商会。其下属的柬埔寨潮乐促进会也将成立，以推动在柬潮乐与潮剧的复兴，目前已经购齐完整的潮汕音乐设备，并已开始进行必要的艺乐师招聘及与潮剧校的合作规划。同时，对潮乐与潮剧的复兴还将进一步延伸至潮汕的民俗仪式，以解决近十数年来柬埔寨潮汕义地祭祀、婚丧仪式都需要从越南千里迢迢延揽相关乐队、道士来柬主持仪轨的不便。而不管是广东商会抑或是潮汕商会，柬埔寨粤属华人新移民几乎都以中小企业业主、商人、买办、驻柬干部为主，从事行业涵盖的范围也远比其他地方商会更广，加上方言、习俗与乡缘的优势，其成员在柬埔寨商业经济活动中与当地潮汕华人联系更加紧密，对人际网络、市场发展与商情资讯的敏锐度及更新速度也更优于其他新移民群体。

四 柬埔寨华社的世代分层与社团区隔：粤属认同的关键意义

综合上述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我们可以根据社团会员组成将柬埔寨粤属华人社团分为“旧社团”与“新社团”，亦即由两个不同世代柬埔寨籍华人所组成的旧社团以及由三个不同群体所组成的新社团。其中根据笔者的前期研究成果显示^①，新社团包括前文所述中国总商会及柬埔寨台湾商会、柬埔寨港澳商会以及其他半官方组织和自发性业缘组织；旧社团包含由战前出生的老移民所组成的传统社团和由 1970 年内战开始后出生成长的新生代青年华人社团，传统社团包含柬华理事总会及其下属的 5 个会馆、6 个公校、13 个宗亲会和 68 个地

^① 详细的柬埔寨华人社会世代分群及其社团组织的归类与差异论述参见 Shihlun Allen Chen, Chapter 3 Living through the Killing Fields: The Ethno-history of Chinese in Cambodia, in “Socializing Chineseness: Cambodia & Ethnic Chinese Communities as a Method”, pp. 58 - 90.

方理事会，而新生代华人社团则是以柬埔寨华人商业总会为首的相关血缘与业缘组织。

粤属华社新旧社团的会员资格和会籍认定有所不同，以柬埔寨潮州会馆章程中的会员资格条款为例：

（四）会员资格：凡居留柬埔寨王国中的中国广东省潮州裔人士，年满十八岁，赞成本会宗旨，品性端正者为自然会员，进行登记，缴纳会费者为基本会员；本会立案人、固定财产注册人及一次性缴纳五年会费者为永远会员^①。

基于上述章程中的会员资格条款，其会员必须是“居留在柬埔寨王国中的中国广东省潮州裔人士，年满十八岁”，而根据潮州会馆办公室主任接受笔者访问时的解释，所谓的居留在柬埔寨王国的潮州裔人士的规定，一般都以拥有柬埔寨国籍的华人为主，只有部分顾问是战时逃离战祸、避居海外的柬埔寨华人，是非柬埔寨籍（法国、美国、香港、澳洲、泰国籍等）；目前第五届所有理事成员都为柬埔寨籍的潮汕裔人士，除了少数几位年轻（四五十岁）的理事之外，几乎都能同时操持普通话、潮汕方言和柬语。

另一方面，由近年新移民至柬埔寨的拥有广东省地域认同的中国公民所组成的柬埔寨广东商会即为“新移民社团”，其会籍认定则相对简单，只需缴交会费和报名表，分个人会员和企业会员两种。目前广东商会中有许多在广东、香港经商、工作多年，再转赴柬埔寨的会员是不会说广东话或潮汕方言的，因此广东商会在开会时仍以普通话为主，只有部分会员间的私人谈话才以粤语沟通。

进一步对“两馆两会”的会员、会务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初步发现三个特点：

（一）新旧社团会员的年龄、家庭结构与心态存在差异

根据笔者的田野观察与访谈，两个粤属会馆的新一届会员干部组成仍以年纪较长的耆老长辈为主。一如潮州会馆的黄焕明副会长所言，近60岁的他在理事和会员间已经算是年轻的一位，目前会馆的主要干部和领导多为六七十岁、战前出生并接受旧式华文教育的老人，因而青黄不接的世代交替一直是社团面临的主要问题。而广肇会馆的蔡迪华会长更明言，这样的世代差异是传统社团无法避免的结构问题，因为公益、慈善性质的传统社团多以事业有成而想回馈社区的老一

^① 柬埔寨潮州会馆《柬埔寨潮州会馆重建委员会暨首届理事会特刊》，1994年，第51页。

辈为主,年轻一辈目前都专注于事业发展和个人家庭生活,花时间、花钱而没有钱赚的社团活动自然缺乏吸引力。反观新移民的广东商会,其会员以中壮年的新移民为主体,商会的活动自然是以事业发展、互助为主要动机。商会成员多半是远离家乡至柬埔寨奋斗、事业甫起步的中壮年企业家、自营商和外派干部,许多人是单身或夫妻来柬,即便有小孩一起来柬,小孩也多半还在就学年纪,因此多半成员经常往返柬粤两地。加上诈骗、侵占、组织犯罪等负面新闻时有发生,因此对于许多老移民来说,与新移民相处更增添不安定感,不如老移民间相识数十年,彼此“知根知底”。而对于新移民来说,老移民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性和地方人际网络的优势,是他们羡慕却也害怕的“双刃刀”。因此两方在涉及金钱、生意往来的事宜上都更显得谨慎、小心。这样的新旧移民身份差异,也反映在新旧社团的互动上,一方面双方拥有不同的生产要素和优势,因此互相需要也互动频繁,但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彼此的背景、财务、家庭、事业、诚信、地域认同程度的差异都有强烈的敏感度,从而显著地限制了新旧移民跨界往来的可能性。

(二) 新旧社团的会员互动频繁但界线清楚

根据笔者田野调查收集的干部名单显示,旧社团和新社团的主要成员间完全没有重叠。两个粤属会馆同样归属于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两馆间成员反倒略有重叠与流动,但是旧社团与新社团间上没有如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所述的交错网络(inter-locking)的现象^①。许多新旧粤属移民间因为生意、私交、公益、文教等事务来往频繁,一如广肇会馆蔡迪华会长所言,“毕竟金边不是很大”,大家都热心为(柬华)社区、国家(柬埔寨)、祖国(中国)做事,有很多机会互动见面,但是即便如此,因为国籍、语言、年龄、社交圈的差异,目前金边粤属社团内新旧移民的组织界线、活动范围仍然是壁垒分明的。这样的组织结构分流并不等同于社交分流,传统华社的“五缘”人际交往方式仍是当前柬埔寨华人社会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长期内战后传统的社会关系与世代关系薄弱的情况下。

(三) 新旧社团的会务重心和属性不同

随着历史和社区的发展,旧社团的会务范围主要在于“华文教育”、“会馆、庙堂、义地管理经营”、“组织间互访、公关往来”、“固定年度祭祀、周年活动”等四大类。根据潮州会馆副会长黄焕明表示,文教事务几乎占会务工作量超过一半以上;广肇会馆会长蔡迪华更表示,广肇学校的工作是会馆最主要,也最重要

^① G. William Skinner, *Leadership and Power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Thailand*, Ithaca, N. Y.: Published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8.

的一项工作。而隶属于中国总商会的广东商会，作为甫成立的新移民社团以及地方商会之一，其最主要的任务则是对口接待、急难救助、会员联谊、招商引资、商情交换、慈善捐助等。由此可见新旧社团的会务重心有所差别。旧社团在以华文教育和传统维持为主轴的前提下，主要功能在于动员、联系与华校经营等乡缘公众利益事业，通过社团的运作维持华人文化、祖籍地认同与传统的延续；而新社团则以互助、互利、合作的业缘社交为主轴，重视商业发展、跨国网络和共同繁荣的经营合作功能。新旧社团会务重心和属性的差异，加上前述成员组成的差异，使两者间目前尚难形成一个共同的认同感（belongingness），以致缺乏广泛的合作与整合。虽然两者的乡缘、方言基础其实具有高度兼容的可能性，但是目前两者间的整合与趋同发展还处于探索和萌芽阶段。

简而言之，目前柬埔寨老移民的粤属社团和粤属认同多以柬埔寨国家认同为前提，以潮汕、广肇地区的生活饮食文化、方言、祖籍地认同等地缘认同为辅，并以传统的华文教育、祭祖扫墓、宫庙祭祀和社交网络等方式来延续身份认同和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在国家认同明确的情况下，对自身文化与族群身份的认同实际上是以群体的日常生活方式为集体认同的核心，而这种以日常实践为核心的集体认同感（collective selfness of daily practice）在柬埔寨这样历经长期内战的后冲突社会更显得重要。因为长期内战导致的社会解组、教育断层、家户社会化功能不足使得家族、群体与社区文化取得（acquisition）中断或不连续，因此潮汕/广肇方言、饮食习惯、祭祖扫墓、婚丧喜庆习俗的实践选择与细微差异就成为他我（self-other）划分的实际界线。而这样的他我区分通常在一开始见面的语言选择与自我介绍的资讯交换时就产生了实质的亲疏差异，因此共同的潮汕/广肇方言能力、社交圈群体的重叠性、祖籍地与家庭背景的共同性、社群组织活动的交叠与仪式性的社交方式选择便从根本上影响了后来相互往来的信任感与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以同乡/乡缘/祖籍地为表现方式的地域认同的人际连结强度仅次于血缘，却仍远高于关注共同利益的业缘，也胜于共享有限生活经验的物缘、学缘和神缘认同。这在日常的人际往来中即如潮汕知名俗谚“啲家己郎”（都是自己人）、广府话“同声同气”一样的人际连结。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大量中国企业在柬埔寨投资产生就业与经济效应，加上华文教育成为了柬埔寨教育发展重要的一环，来自中国各地的中国公民、海外华人在中柬二元分化的国家认同层面上差异空泛，同时普通话与英文的普及也使在柬华人间的人际来往更关注细微的认同通同与差异（sameness and difference）。而这样的通同性的寻求（grouping of sameness）也正是上述粤属社团

身份认定的根本动因，也是多样的地域身份认同感比广泛的文化认同感更能在日常社交实践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根本原因。

五 粤属华校与粤属认同的式微

讨论完族群认同与次族群差异的关键意义，接下来必须聚焦的一个问题则是粤属社群内部的文化延续与社会化程序问题，尤其是粤属社团的文化延续及其所属学校的经营与培育方针（cultivation objectives）对粤属认同塑造与延续的影响。延续中国国家汉办的全球汉语文化教育大战略的视野，柬埔寨华人理事总会麾下的方言会馆和地方柬华理事会皆有其附属的华校，粤属的两大会馆亦有端华学校和广肇学校。柬埔寨华校为社团所属的公办私有学校^①，都是接受柬埔寨王国教育部管理、以汉语教学的基础教育机构，因此它们面对的不只是语言学校间的竞争。从内战结束迄今，在公办义务教育缺乏质与量的条件下，柬埔寨教育部门几乎由私人教育机构取代，尤其是在四大都会区（金边、暹粒、马德望与西哈努港），以英文、柬文为主的私人教育部门几乎取代了国家的义务教育系统^②。因此华校的经营更多面对的是多语课纲、师资素质、资本规模、就业竞争力以及升学衔接等多方面的复杂竞争，传统华社组织所经营华校几乎都面临转型升级、师资、硬设备等多方面的问题。对于传统华校来说，经营中“市场竞争力和招生问题”远比“身份与文化认同的传承培养”更需要获得关注，而这两者间的平衡与冲突，也一直是柬埔寨华社和华校经营的关键。

金边广肇学校作为当前柬埔寨粤属社团的两个直属教育机构之一，身处竞争激烈的华文教育市场。广肇学校除了与会馆的下属关系与财务关系，主要以私立教育机构的方式运作，生源招募、财务盈亏与师资教材成为衡量经营状况的主要标准，而对粤属身份的延续与建构则缺乏条件。

蔡迪华会长在访谈中就广肇学校的经营问题与笔者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深入讨论，认为华校必须在软硬件的质量与课纲设计上加强市场竞争力。蔡会长以近三年广肇学校的变革与发展为例，明确地说明惟有提高华校在软硬件和教学上的质量，即通过中、英、柬文三种不同班别的变革，同时提高教师质量，提高学校

^① 延续内战前五大会馆通称为公司或公会的社区公产概念，当前柬埔寨华人社会一般将会馆所属学校定义为会馆公办学校，但其在柬埔寨官方仍登记为私立教育机构。因此，本文将其简称为“公办私有学校”，以与柬埔寨国内其他私立华文学校或主流的私立英语教育系统有所区别。

^② William C. Brehm, Iveta Silova and M. Tuot, “Hidden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Education in Cambodia: The Impact and Implication of Private Tutoring”, Education Support Programme Working Paper Series 29, 2012.

毕业生在就业市场的竞争力，这样家长才愿意付出更高的学费。唯有强化华校市场竞争力、增加生源与收入，会馆才能有充分资源支持自主性的课纲与题材选用，通过地方文化教材的编定选用与师资的任用，形塑新一代柬埔寨华人对传统中华文化的理解，并延续、提高柬埔寨华人对自身文化与族群身份的认同。基于这样的华社持续发展的信念，蔡会长在访谈中提出了两个关于华校发展的重要问题：一是教材，二是师资培训。在教材方面，蔡迪华会长指出，柬埔寨拥有超过40万华人，光金边就有25万左右的华人。华校最欠缺的是适应柬埔寨本土的教材，目前现有的三四种教材版本已经使用多年，在质量上已经没有办法满足当前学校教育的需要。譬如，暨南大学的教材版本编写对象以欧美的汉语学校为主，而柬华理事总会的版本也是十几年前以马来西亚华总版本为基础编写的，不管在内容还是印刷质量上都需要重新编撰与设计。而在旧版本不堪使用的情形下，必须同时兼顾学校和学生使用成本情况开展编写，因而在中国经济崛起，外事机构资源大量挹注的当前，也许正是华校在课纲设计与教材编选中加入更多柬埔寨本土文化与华南地域文化认同的时候。因此，国家汉办与侨办的支持在海外华文教育中就扮演着格外重要且关键的角色。蔡会长严正地建议，侨办与汉办应该延请国内专家学者，与柬埔寨本地的前线教育工作者一起合作，编写一套适合柬埔寨超过90所华校及过百所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使用的教材，而非全球一致使用现有两个教材版本。

另一方面，蔡迪华会长亦表达了汉办与侨办的师资支持与志愿者老师对柬埔寨华校的重要贡献。目前这些来自祖国的师资在柬埔寨华校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不管是在教学方法还是教材资料上都大大提升了华校的教学质量和文化氛围。但是目前年轻的志愿者老师和援教的老师存在任期有限、流动性高、课程与教学缺乏延续性等问题，这对华校的经营亦有影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之道，蔡会长认为还是在于本地师资的培养、进步与升级。但是，要培养本地师资，不管是公费留学还是短期赴中国受训都不切实际。因此蔡会长认为，惟有一个常设的“柬埔寨汉语师资培训中心”，加上一个系统化的教材、试卷、图仪数据库，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而这样的机构的设置与成立，不管在软硬件上都需要国家侨办与汉办的领导与支持。只要侨办与汉办能支持，一如孔子学院的成立，柬华理事总会内部就能进行相关推动，广肇会馆也能在选址与人事上倾全力支持与配合。

从上述广肇学校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当前的市场化竞争与营运困难，广肇会馆下属学校首要的任务在于营运的延续与教学品质的巩固，而无法继续肩负延

续与传递粤属认同的功能。一者其课纲设计必须同时迎合市场需求与华社华文教育的调控,对英文与柬文两种语言的市场需求的考虑更重要于粤属认同的延续与塑造;二者会馆对于所属学校的经营主旨也不受地域认同、方言使用等差异的影响,过度强调广肇与粤属身份的文化延续更限制了招生的来源与毕业生的发展竞争力。这种状况不同于 1960 年以前的法属殖民传统,当时 5 个华人帮群的方言差异与族群关系紧密连结强化了地域认同的分群现象,而使得当时会馆与其所属学校肩负更多延续祖籍国与地域认同的功能。然而长期的内战与族群融合使得次族群间的差异与分群显得模糊而浮动,在会馆耆老与管理者的认知里,如上述的馆属学校的营运风险与危机才是主要的经营考虑,而非通过学校课纲设计与活动规划延续和塑造粤属地域认同。这样的市场考虑显然有其必要性,也是会馆公办私有学校在营运经费和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必然考虑,但是对于广肇学校上属的广肇会馆而言,却意味着会馆与所属学校已经不具备如战前旧时的强大乡缘认同塑造功能。

另一方面,就柬埔寨华社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潮州会馆的发展来看,也面临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个是成员老化与世代传承的问题。年轻一辈的潮州青年对自身潮州裔身份的认同不足,对于个人传统的祖籍背景、文化根源、地缘社交等认同不足,因此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对于以此为背景的传统族群社团缺乏连结与认同,加上传统社团强调伦理、辈份、阶级、仪式、身份、宗教信仰与财富实力的特性,年轻人对传统社团所办的传统节庆、文化、祭祀活动参与度不足。其更深层原因主要在于,长期内战与颠沛流离不但使得柬埔寨华人个人家庭历史、文化传统与生活背景失去世代间的家户教育与传承,更阻断了三个不同世代的族群认同,使其对自身成长的中华文化缺乏体会与连结。而新柬埔寨王国政府 1993 年成立以来,快速的重建过程与经济发展也使得所有的青壮年都专注于事业与经济活动。因此,柬埔寨华社在战后的复兴也仅引起在战前出生并接受旧式华文教育的老一代华人的重视与兴趣,而对于战时和战后出生的两个世代来说,不管是华人身份还是粤属认同都只是遥远而缺乏实际生活体验的家族故事,他们即便能操持潮汕方言,对于传统潮州人独有的传统文化习俗也缺乏深入的认识和认同。

柬埔寨潮汕裔人士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方言与祖籍认同的式微。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柬埔寨的国际化,新一代的潮州裔年轻人甚至都是可以讲得一口流利的中、英、柬文的“三语通”,然而对于自己家族世代传承的潮汕话却一知半解。对于许多年轻一辈的柬埔寨华人而言,潮汕话和其他方言是家里祖父辈讲的土

话，难登大雅之堂。许多受访的年轻一代与青年学生都宁可与笔者用英语、普通话或柬语交谈，而羞于用潮州话或广东话。一位受访者更明确表示，他与最好的华人朋友同学之间都是用柬语交流，在学校和有其他人在场时才用英文或普通话。也就是说，方言对许多年轻一辈的柬埔寨华人来说，只是纯粹用来与老一辈家人沟通的母语。在柬埔寨华人年轻一辈几乎完全以柬语和英语为主的情况下，父母亲通常只能要求他们同时精进普通话而非潮汕或广肇方言。因此，即便主流的柬埔寨华人商务圈目前仍以潮州话和柬语为主，年轻一辈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却逐渐以英语和柬语为主。

语言上的落差也使得柬埔寨的商业经济圈形成了极大的世代鸿沟，老一辈的商业模式、经营风格、交易方法一如传统社会一般，维持高度传统的华人社会习俗、人际社交模式、方言习惯和入社使命感。相反地，青壮年一辈则以柬埔寨首富陈丰明（Kith Meng）等年轻企业家和富豪所主导的柬埔寨总商会（Cambodia's Chamber of Commerce）等业缘组织为主要场域，以英语、柬语为主，法语、普通话为辅，从事国际经贸和跨国商务活动。两个世代间显得格格不入，且多半缺乏往来互动。虽然许多老侨领的子女后代也积极参与年轻一辈的商会组织，但是在经济实力、社交方式和国际视野等差异下，两边的关系疏远且缺乏互动。以柬华理事总会为首的传统社团和柬埔寨华商总会都创立于20世纪90年代，20年来彼此间的互动却仅停留在个人与社交应酬场合的层次，这样的世代疏离感和两极化的社会分层更说明了柬埔寨华人身份认同，尤其是粤属潮汕、广肇认同的式微。

六 地域认同对于落实侨务政策的必要性

由前文对当前柬埔寨粤属社团发展现状及其地域认同塑造的分析讨论，可见当前柬埔寨华人社群中以潮汕与广肇为实际粤属次族群身份划分（sub-ethnic classification）的实证存在（empirical existence），这样的次族群身份具体表现在社交组织的分流与会籍身份的运作上。这样的运作不单是从法国殖民时期五馆分治与会群自治延续下来的殖民遗绪，更是新柬埔寨王国政府成立以来，柬埔寨华人与在柬中国新移民寻求社群交集（social engagement）、身份连结、人际网络的重要认同工具。然而这样日常中被实际广泛运用的地域认同、文化通同等社会资本条件，却和方言一样因为世代交替与市场竞争而面临逐渐弱化的局面。换句话说，粤属地域认同对于以粤籍与粤属移民为主体的柬埔寨华人社会而言，虽然是核心的、最重要的社会资本条件，但是却随着柬埔寨社会的国际化、柬埔寨华社

的多样化发展而逐渐淡化、稀释。然而，乡土与族群的个人认同感却是一个更大范围的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基石，如果对贴近自身经验、家庭背景的祖籍地、粤属族群文化和生活方式缺乏认同，更不用去谈论对华人身份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一如王赓武、本尼迪克·安德森、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与白莲娜（Elena Barabantseva）对东南亚华人族群身份与东南亚国族主义发展间的国家认同与忠诚矛盾（national identities and loyalty contradiction）的论述一样^①，当柬埔寨华人的阶层身份、大中华民族或华族认同本身与柬埔寨国别认同两者间具有矛盾与政治敏感的可能时，也许以文化为核心、以乡缘为依托的次族群认同（sub-ethnic identity）会是更好的身份认同调合范式（identity conciliation paradigm）。这种以区域文化与方言为群体共性的地方认同也呼应了施坚雅对泰籍华人混同适应（creolization）及奥克斯（Tim Oakes）对省籍区域认同的推论^②。以柬埔寨粤属社群为例，潮汕和广肇方言为体的方言认同、对粤潮习俗及饮食的地域文化认同，加上通过前述会馆、商会等族群组织的社交实践（social engagement）产生的群我概念，由此构成的以广东侨乡的乡缘认同为区域共通性的次族群认同显然比二元分化的国别身份认同更能提供互补协同作用，而非陷入相斥的、非此即彼的民族认同困境（ethnic identity dilemma）。换句话说，本研究中所主张的“粤属身份认同”或许能提供一个阶层化区隔的认同范式，来理解柬埔寨老移民对自身文化认同与大国崛起焦虑的调和过程，也可以解释新移民一方面利用乡缘认同寻求融入、适应，另一方面又通过优化其身份认同来巩固自身的跨国连结优势。因此，这样的粤属身份认同也可以用以理解不同柬埔寨华人社群对自身国籍政治认同与华人身份认同的最适组合（optimized complexity），以及不同社群之间彼此有所区隔却又相互融合的现状。

根据本文前述的“新旧华人社团的组织结构不同”、“柬华社会世代分层差异”以及“粤属乡缘认同式微”等三个当前柬埔寨华人社会的特点，笔者将整个柬埔寨华社细分为三种不同的施政对象——“传统社团侨领”、“柬华青年领袖”与“新移民”三类。其中“传统社团侨领”亦即当前柬华社会中，在战前出生、

^① Gungwu Wang,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Anthony Reid, and Kristine Alilunas-Rodgers, *Sojourners and Settlers: Histories of Southeast Asia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Elena Barabantseva,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Minorities and Nationalism: De-centering China*, Routledge, 2010.

^② G. William Skinner,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7; Tim Oakes, and Louisa Schein, eds., *Translocal China: Linkages, Identities and the Reimagining of Space*, Routle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目前多为柬华理事总会、华校及其麾下相关组织负责人的老一辈侨领。这些社团耆老多半仍主要使用普通话和粤属方言，高度认同其个人与家庭的华人背景身份，同时对中华文化与祖籍认同也有更强烈的民族情怀。其次，“柬华青年领袖”指拥有西方教育背景、语言能力、专业水平和文化思维，而以英语、柬语为主要语言的专业精英，他们深知自身的文化与族群背景，也视中国的经济崛起与区域角色演变为个人发展生涯的重要机会。最后即是近年蓬勃崛起的“旅居柬埔寨的中国新移民”，他们多半是只能操持中文，但是甘冒旅外的艰辛与风险而响应“走出去”战略的在柬中国公民。这些新移民成立了大量商会、同乡组织、业缘团体与社交团体，在柬埔寨互相扶持，通过不同团体的关系与家乡保持紧密的互动与联系。但是，不同商会、同乡会发展状态不同，也缺乏规范和管理，对于急难救助、信息交换、司法协助与地方融入的需要远高于前述两者。惟有明确地理解当前柬埔寨华人社会内部的群体差异，才能确保我国侨务政策在柬埔寨华人社会的实施效率，适当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差异，而不是一揽子将所有柬埔寨华人视为一个同质群体。本文所讨论的“粤属华人身份认同”也就在这样的前提下，期望通过对柬埔寨华侨华人粤属社团的深入研究和分析，理解以祖籍乡缘、方言认同为核心的族群地域认同不但应该是建构一个共同的中华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石，还可以是不同的侨务行政层级借以团结旅外侨胞的良好途径。无论世代、年龄、专业与语言，一个共同的粤属认同可以说是柬埔寨两个粤属会馆与广东、潮汕商会共同的社会资本。

综合前面的柬华社团文献史料与田野资料，加上前文对当前柬埔寨粤属社团发展现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不管祖籍是潮汕地区还是广肇地区，也不管是世代久居柬埔寨的老移民，抑或是刚刚移居柬埔寨的新移民，粤属认同都是柬埔寨华人社会最主要也最重要的祖籍认同选择。虽然潮汕和广肇两地使用不同的方言，习俗、饮食习惯也稍有不同，但都是广东省境内的一部分。虽然行政区域是后置知识，与文化圈的界定并不一致，而且完整的岭南文化应该包含客家文化等本文尚未论及的部分，但是对于亟待行政资源与政策支持的海外华社来说，一个共同的认同感与明确单一的行政对话窗口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率的途径。因此，与其空泛地讨论文化圈的范围，不如延续现有行政结构与制度，明确地将次族群文化与祖籍地认同丛集成一个共通的认同单位。较长时间以来，中国地方侨办负责与会馆、商会联系，国侨办则肩负着整个华社的联系，这样的行政划分与柬埔寨会馆、商会的历史演变有所不同。另外，现有侨务、汉办、外事、经贸、招商、文教以及不同行政层级的多渠道、多级别的多线联系与互动也造成“叠床架屋”

的多头马车。华社领袖也表达了迎来送往、应接不暇的困扰，即便柬华理事总会已经将柬埔寨华人内部社区结构的沟通与任务统一分配、管理与调控，但是这也同时降低了身份认同多样化和“不同对象，不同处理”的可能性。在两边结构都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一个共同的粤属认同既可以调和两边的结构差异，又不影响当前三级侨办的职能划分与行政资源调配。

相对来说，当前中国侨务系统仍是一个“自上而下”（Bottom-down）的传统行政结构，这样的结构优势在于资源调配不重复、行政效率相对较高和层级施政同步，然而相对地也忽略了地方的差异和政策实践困难度的不同，更忽略了可以由下向上反馈、集中的信息优势和最利于“抚远”的传统“五缘”连结优势。就广东省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最强有力的乡缘、文化根源即是华侨华人日常体验最深刻、最亲切的潮汕或广府文化，地方方言、饮食等生活文化连结才是团结、融合广大海外粤属乡亲的最重要纽带。然而除了省侨办与地方侨办的对外联系与活动之外，如何通过强化乡缘连结、故乡认同、地域身份认同来团结同质性较高的海外华社（如以潮汕人为主的柬埔寨），才是提高、深化侨务政策实施效率与有效性的根本命题。而这样的命题也许可以通过海外华文教材的重新编撰与课纲设计，海外华侨华人间的方言世代延续、传承和推广，或乡缘社团的组织与活动来落实。唯有通过保存与个人日常生活更有共鸣感的地域文化认同，才能更明确并且强化海外华侨华人对“家乡”的认同与连结。

结 语

总而言之，不管是潮州会馆、广肇会馆还是广东商会、潮汕商会都是来自广东地区甚或岭南地区的不同族群组织，却一同在柬埔寨为居住国及祖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因此一个共同的粤属认同，可以用来团结因为方言、次文化圈而有所隔阂的华社。更重要的是，一个共同的粤属认同感可以提高侨务政策的资源分配效率，更可以巩固和强化因为不同世代与移民先后而各自为营的社交群体，提高柬埔寨华侨华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保存和认识，进一步延续海外华侨华人特有的文化、价值观认同及其与祖籍国中国的脐带连结。

【责任编辑：吴宏娟】

should raise the stability in the maritime area of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decrease chances for the relevant disputes to disturb the Sino-Philippines economic cooperation through fishery and oil-gas cooperation. What's more, China and Philippines can promote mutual trust with each other to enhance the foundation of bilateral economic cooperation.

【Keywords】 the Philippines; Economic Relations; Economic Cooperation; Trade Structur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Authors】 QI Huaigao,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LIU Qingyao, PH. D. Candid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antonese Ethnic Organizations in Cambodia

Shihlun Allen CHEN

【Abstract】 The article is a pioneer ethnographic work on Cambodia's Cantonese ethnic organizations focusing on its ethnohistory, status quo, and development predicament. Based on Author's intermittent ethnological fieldwork in Phnom Penh during 2013 – 2017, the historical making of the sub-ethnic community, its current community structure, organizational diversification, and educational continuity of the local identity have been discussed respectively. On ground of Cambodia's colonial heritage, ethnic hierarchy, and current inner 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structure, the Author adapts a chronological analytical frame to understanding how sub-ethnic organizations situates and local identity is constituted within current socio-political environment. After introducing the operative details and development predicament of current 4 sub-ethnic organizations, the article is concluded with the discussion on the empirical 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sub-ethnic and local identity application with Cantonese cases in Cambodia.

【Keywords】 Cambodia;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Organizations; Local Identity; Sub-Ethnic; Chinese Community; Cantonese

【Author】 CHEN Shihlun Allen, Associate Research Fellow,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Center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